

“知青”杜建坤：

在错的时候遇上对的人

文/片 本报记者 任鹏

63岁的北大荒知青杜建坤没想到，一个简单写点回忆录的想法，竟然变成了一场1200多位老知青重逢的大聚会。

知青们自费出版了一本《情系大兴岛》回忆录，5月18日的聚会也是发行仪式。

三十多年前，在两条河流环绕的大兴岛，有着或美好或痛苦的回忆。这次聚会，杜建坤发现，在后三十年的人生中，战友们一直在努力把痛苦的回忆剥离。

也有怀念，但是怀念那个年代的精神的愉悦和岛上老乡的淳朴。

杜建坤在看热播的电视剧《知青》，也感觉到了一股“知情热”正在出现，他觉得这股潮流，可以让现在回望那段历史和积淀的精神。



杜建坤(左)与刘宝河。

5月26日，北京。

一个旅行包，一身休闲服，还有一个开心的笑容，要不是手上的导盲杖，没有人想到，这个刚刚在老挝、泰国、越南、柬埔寨玩了24天的中国游客，竟是位盲人。

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正午，你直视这双眼睛，它们却无法回视你。在刺眼的阳光照耀下，它们呈现出暗暗的、泛着空洞的灰色。

这双眼睛的主人曹晟康，坐在一个招待所香色的沙发上，这是我的固定采访地，在这儿接受采访不下六七次了。”这个35岁的盲人说。

看不清世界，
但得让世界看清我

4月18日，从云南西双版纳的磨憨陆路口岸，进入老挝的城市琅布拉，曹晟康的异国之旅正式起航。

“4月23日，我从万荣出发，一个人拿着导盲杖，背着行李，用仅会的英语问路，当地人告诉我，往南走就是万象。”曹晟康随身携带的录音笔里，记录了他在老挝脱离驴友后，独自上路的过程。

第一天独行，他显得慌乱和局促。行走中有时会突然忘记自己的方向，就只能站定然后重新寻找方向。

“就像我当初一下子失明那样不知所措。”曹晟康说。

即使普通人，独自赴异国旅行都是件很有难度的事情，语言不通，环境陌生，还要面对随时发生的突发状况。

对于一个盲人来说，他不但要面对所有的常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要战胜自己心理上的恐惧。

“后来我就想，一点都不用怕，人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恐惧本身。”

语言不通，是曹晟康遇到的第一个障碍。

“想找旅馆睡觉，就打电话，想吃饭就把吧嗒嘴。”这是旅行中他总结出的最好用的交流手段。

结账或是兑换货币同样需要手语，“货币都是好心人帮我兑换的，我没办法分辨货币的面值，会请别人帮我把手大面值的钱放上面，小面值的钱放下面。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骗过我，反正我没觉得有人骗过我。”

第一次在高速公路边搭车，盲杖没有探到路，曹晟康一头栽进路边的沟里，“如果沟深一点儿，下面有水有石头，我也许就绝命了。”从沟里爬上来，曹晟康头上、腿上全都是伤。“哭不解决任何问题，要站起来还是得靠自己。”

的500人的礼堂。”

5月18日，这些头发花白的当年那么年轻的知青再次相逢，看着一张张似曾相识的面孔，就是不敢认。

聚会现场也是回忆录的发行仪式。在大兴岛呆了六年的作家肖复兴被请来为回忆录作序。

他看到战友们无数的人生第一次，这些第一次，“剪辑，拼贴成一代人苦涩却别有一番滋味的青春。”

“这就是个人命运”

杜建坤曾在北大荒呆了11年，和普通知青不同，他们属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，在离珍宝岛很近的大兴岛上，过着准军事化的屯垦生活。

回到北京三十多年，他仍和几个知青保持着伙伴般的朋友情。

去年，几个人喝酒聊天，杜建坤想邀大伙写写回忆当年垦荒的岁月。有人提出，干脆出本回忆录，就写北大荒的知青故事。

61岁的刘宝河在老知青网开辟了这个论坛，发出了征稿启事。

“口碑相传，一直杳无音信的战友们的联系方式越来越多，回忆文章也收到了几百篇。”在家里，杜建坤和刘宝河整理这次聚会的开支明细。

人越凑越多，大家提议，干脆趁着回忆录出版的发行仪式搞个联谊会，让分别三十多年的知青们重新相聚。

“最终报名人数有1200多人，当时还担心没人来，租

“也有人真不愿意去，不想离开家，但没办法，只能被这股潮流裹挟着往前走。”杜建坤说。

有的人去了就永远回不来了。刘宝河回忆说，下乡知青有工伤牺牲的，也有自杀的。

当杜建坤一步步从知青班班长、排长成为指导员时，一位叫刘佩玲的女知青，因扑救荒火被严重烧伤，“她成了救火英雄，人人都要学习她，可她五官残废，手指都烧没了。”

杜建坤曾去哈尔滨看过刘佩玲，后来各忙各的生活，渐渐失去联系。

再后来，杜建坤听说，刘佩玲自杀了。

有时，杜建坤会想起刘佩玲，“这个漂亮、年轻的女孩，就这么消失了。”

回忆录里有一张刘佩玲的照片，别着红星的棉帽下，是一张有着羞涩笑容的青春的脸。

“这就是个人命运，在那段滚滚前进的历史中，每个人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。”

剥离痛苦的后三十年

杜建坤同样无法把握。去年退休前，先后在私企工作10年的他，用“平淡”总结自己的后半生，“不算成功人士，也没论为社会底层。”

住的房子在南四环以内，杜建坤很庆幸在房价疯涨前以每平米一万八的价格买下来。

回城后，和大多数知青一

样，杜建坤接了母亲的班，在一家小单位上班。干得不错，但因只有初中文化，提干受限，再后来更没机会了。

所以他才遗憾因为去北大荒错过了上学的机会，到了大兴岛，他原本也有机会上学，“单位不放人。”

刘宝河对老友杜建坤的评价是：有能力，没碰上好时候。

早两年回城的刘宝河分到建筑公司做瓦匠，1982年“下海”，卖菜、卖服装，搞包工队，现在开了一家物流公司，规模不大。

有人说，那段经历什么也没留下，青春荒废，学不到技术，永远失去受教育的机会。回城后，年纪大了又下岗，挺惨的，对那段经历就不愿意提。”杜建坤承认，知青大都过得很坎坷，没房子住，工作单位不理想，很艰难。

刚回城上班，领导夸杜建坤工作劲头像小黄牛，“我学得没什么，工作强度和我在大兴岛比差远了。”

刘宝河之前曾建了一个网站，有知青发起一个辩论：完全在大兴岛消逝的全部青春，到底是无悔还是有悔？

辩论很激烈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“每个人有不同的感受和人生，允许有不同的想法。”杜建坤说，未来是往前看的，有那么多恨也都过去了。

刘宝河后来太忙，网站就关掉了，“重要的是人生经历，这种经历也是财富也是收获。”

央视热播的电视剧《知

◎小资料

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世界有盲人4000万到4500万，低视力者是盲人的3倍，约1.4亿人。中国每年会出现新盲人约45万，低视力者135万，即每分钟就会出现1个盲人、3个低视力患者。到2020年，我国视力残疾人数将达到5000余万。

◀曹晟康在越南还体验了一次漂流。

有当地人，也有外国的驴友，他们会帮曹晟康找有中文服务的旅馆，帮他找车站，帮他兑换货币。

在金边，曹晟康发高烧，晚饭吃不下，头疼得要裂开似的满地打滚，“当时一对台湾情侣结伴赶忙去帮我买了药。”

曹晟康记忆最深刻的一次，是在泰国曼谷街头，曹晟康想找家中国银行取钱，一个当地的年轻人义务为他引路，转了很久都没有找到银行，因为没能帮到他，年轻人难过地抱着他哭。

“虽然看不到风景，但我能感受到人心。”作为对帮助过他的人的答谢，曹晟康会帮这些人做按摩，他专业的手法让帮助他的人很是受用。

开始旅程前，曾有人断言，说他“会死在国外”。24天内，曹晟康确实不止一次面对过生死考验，但最终都挺了过来。

帮助他的人里有中国人，“以前觉得大家会歧视残

这次聚会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回忆那些年的快乐与幸福，把不好的回忆深埋心底。杜建坤和多数伙伴努力把自己后三十几年的人生，当做是一个逐渐剥离痛苦的过程。

即使那段痛苦忘不掉，但不管是历史的错误，还是个人命运的无奈，都已经过去。

青春无悔

还是青春有悔？

杜建坤和刘宝河坚持认为，去过大兴岛的知青，和少数留在城里的人是有所区别的。

“那段经历对个人性格有塑造作用，狂妄的少年们开始成长，文化知识没有学到，但培养了一种精神。”杜建坤很难具体描述这种精神的内涵。

老知青的个体回忆，多集中在曾影响自己的一些人身上。

李凤栋记得，北大荒人生之剧要结束时，当地给了知青很多帮助的老乡杨德云演出的一幕幕：这个因出身被打成“不戴帽子的反革命”的汉子，顶着零下四十度严寒为知青卧冰取鱼，艰难地为李凤栋送行。

肖复兴也为此感动，他坚持认为这些人帮知青在青春时节奠定了来自民间的朴素立场。

“如果青春真的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，曾经有杨德云这样的一些人出现，青春并非一无所获。”

曹》让杜建坤找回了相似的回忆。而最近，有文艺圈的人找到他和刘宝河，邀请他们参与创作知青题材电视剧，希望借有着知青经历的两个入打造更真实的情节。

“我能感觉到，新一轮的‘知青热’又开始了。”杜建坤说，“知青积淀的精神，一直影响着后来的人生发展，也走出了很多成功人士，习近平、李克强、姜昆，聂卫平时不都是知青吗？”

刘宝河觉得，政治和生活的磨砺让知青的承受力、宽容度、对困难的态度不一样，处理能力更好些。“积淀下来的精神和文化内涵有艰苦奋斗、无私奉献，还有舍己为人，敢担当。”

杜建坤觉得，‘知青热’的出现，能够让现在的人回望那些精神，了解那段历史，“希望反过来影响现在。”

老知青的个体回忆，多集中在曾影响自己的一些人身上。

李凤栋记得，北大荒人生之剧要结束时，当地给了知青很多帮助的老乡杨德云演出的一幕幕：这个因出身被打成“不戴帽子的反革命”的汉子，顶着零下四十度严寒为知青卧冰取鱼，艰难地为李凤栋送行。

肖复兴也为此感动，他坚持认为这些人帮知青在青春时节奠定了来自民间的朴素立场。

“如果青春真的蹉跎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话，曾经有杨德云这样的一些人出现，青春并非一无所获。”

周汝昌：

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

文/本报记者 刘德峰



晚年的周汝昌视力几乎为零。

2012年5月31日凌晨，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，他被誉为“红学泰斗”，也被批作“闭门造车”，然而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无法否认，周汝昌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。

抛去无数的赞誉和批评甚至人身攻击，周汝昌选择安静地离开。“不开追悼会，不设灵堂，安安静静地走”，周汝昌留给家人这样的遗嘱。

实际上，周汝昌先生是留恋这个世界的。

2002年周汝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：“我虽然84岁了，经历了大悲、大喜，但我很留恋人间事。像我这样的人积累一点东西不容易，我现在写作的精力非常旺盛，几乎每天写几千字的文章，我现在靠半只眼睛拼命干，就是因为我还有没做完的工作，我积累了几十年，不就是要把成果留给后人吗？”

于是，在说出这番话7年之后，已是耄耋之年的周汝昌先生，在2009年推出了百万字作品——《石头记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》。

有人评价此书，“恢复了曹雪芹的真笔原文，是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一部真本《红楼梦》。”也有人评价称周汝昌先生在书中“篡改原文”，“以一家之言，扰人心目”。而周汝昌先生直言，“这部三新本是我经历60年努力的心力结晶，但并不等于是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，只是表明这是一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报告和虔诚的献礼。”

对《红楼梦》的虔诚，让周汝昌沉浸在红学的研究里，几乎花费了一生的时间。

1918年生于天津的周汝昌先生，自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述《红楼梦》的故事，也是从母亲手中，他第一次看到古本的《石头记》，如果说他的母亲在周汝昌心中播下了《红楼梦》的种子，那么周祐昌和胡适则让这颗种子破土而出。

1947年，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，收到一直进行《红楼梦》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祐昌寄来的函。在此函中，周祐昌说他看到亚东版《红楼梦》卷首有胡适的一篇考订文章，其中有“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”的新论说，他让周汝昌查证。

带着兄长的嘱托，周汝昌查遍了燕大图书馆，终于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《咏芹诗》。兴奋之下，周汝昌将这一

发现撰写成文，并在《天津民国日报》副刊发表。胡适看到文章后，开始与周汝昌在书信中探讨《红楼梦》。翌年，正在撰写《红楼梦新证》的周汝昌，还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，此次拜访，周汝昌拿到了胡适珍藏多年的孤本《甲戌本石头记》，这让他倍感激动。

1953年，《红楼梦新证》出版，这部著作被称为“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”，“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”。

红学家邓遂夫说，这本书引起很大轰动，“一时洛阳纸贵，一个季度连印三版，当时在台湾的胡适连加赞叹，称周汝昌是他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弟子，‘才华很高’。”

周汝昌的一生并不平静。1954年，他卷入“批红小将”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、胡适的批判；1968年，作为“周扬文艺黑线”上的活标本，他被关入“牛棚”；作家刘心武对《红楼梦》的探秘引发争议后，他又被指为刘心武的“老师”，遭到红学界的非议。另外，还有清史学家专门出书批评周汝昌的考证文章，直到晚年，周汝昌的生活才相对平静。

今年4月初，唐师曾探访周汝昌时发现，自1979年以来，周汝昌一直蜷缩在北京东城一处蜗居中，居住条件从未改变。

“平生一面旧城东”，周汝昌过着俭朴凄凉的老老年生活。这与《红楼梦》一书及相关的影视、旅游等产品带来的巨额产值反差巨大。

可他就是这样专注于研究的一个入，“抛开他红学观点的争议性，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，他为后人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and 参考意见。”邓遂夫说。刘心武也认为，周汝昌对于所谓“外行”和“业余研究者”的包容和支持，是他身上最为可贵的品质。

“红学到目前为止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？我自己都怀疑这个命题。《红楼梦》学术研究上有哪些贡献？有哪些突破创新？那都只是以前的学术成就。红学近年没有什么突破、创新。红学不要忘了‘学’字，它是需要不断学习，不断创新突破的。”

2011年，周汝昌在接受采访时，仍对红学的未来充满希望。

他的红学研究不是从“红学”到“红学”，而是从中华文化到《红楼梦》。

偏鉴

陈里：

人人都可以是“阴谋论者”



质疑好像永远是国人的第一反应，所以，陈里这次有点躺着也中枪的感觉。

作为陕西省公安厅副厅长，陈里最近做了件很简单的事。

5月27日晚，他自嘲腰包请8名农民工在西安市鼓楼广场吃了羊肉泡馍，至少在这4个多小时里，双方像兄弟、哥们儿一样平等地聊天。“水电气”们没把陈里当成领导，陈里也没把这8个人看得很低。

围观的十万网友却没把这事看得很简单，围绕在陈里周围的好官员体察民情的赞美和作秀，找托的质疑，都拔高或贬低了陈里。

其实这就是简单的一顿饭而已，平常得甚至像是我们常在夜色街头见过的小吃摊上的饭食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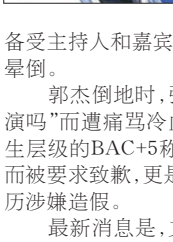
但“陈里请客”却被赋予如此之多的意义，这仅仅在于，网友们看重的是公安厅副厅长陈里，忽略了管理学博士、“三农”问题学者陈里。
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各层次的公务人员，被普通民众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与希望，或者收获了太多的失望与绝望。

这个社会生了一种病：人人都是“阴谋论者”，宁可戴着灰暗的眼镜寻找阴谋，却不愿意相信温暖与美好。

这可究竟怪谁呢？

郭杰：
当质疑者被质疑



留法学生郭杰一脸尴尬地走下非你莫属舞台后，这周，波澜再起，节目主持人张绍刚和嘉宾文谦，被李开复率领的一千名人、众多网友的质疑推到了前台。

郭杰表现出的远不如李开复鲜明的能力备受主持人和嘉宾质疑拷问，最终因紧张而晕倒。

郭杰倒地时，张绍刚因追问“你是在表演吗”而遭痛骂冷血，文颐被法国大学研究生层级的BAC+5称为“技术学院大超级别”而被要求致歉，更是爆出她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涉嫌造假。

最新消息是，文颐就职的网站被黑，她在微博致歉后，删掉其他微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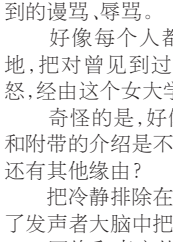
最初的质疑者成了被质疑的对象，这一反转颇有戏剧性。

事件发展如此纷繁复杂，以至于没有人能拨开郭杰是否作假、节目是否炒作等围绕这一事件的众多争议批判的迷雾。

但最起码的，怀疑这个留法学生是个大骗子演戏装晕之前，得看清楚，他首先是一个倒地无助的人。

抛开这一切不说，至少能够清楚的是，有时，质疑与批评的犀利尖锐，远比不上最起码的宽容与尊重的力量。

球鞋女生：
你以为的事实也许不是事实



和上述当事人面对的质疑声相比，那个姓名至今仍不为人所知的女大学生的遭遇，可谓轰轰隆隆。

“深”及脚踝的积水，把对曾见到过的其他失德大学生的愤怒，经由这个女大学生出口发泄。

奇怪的是，好像没人会问问，这张照片和附带的介绍是不是真实的？事情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缘由？

把冷静排除在外的各种情绪，已经挤占了发声者大脑中把事情搞清楚的空间。

网络和真实的世界一样，也许，你所以为的事实，并不是事实。

即使大事件，诸多公众舆论同样是被操控用来引导公众的情绪，达到某些人希望看到的样子。

所以，在了解真相以前，安静是最好的态度。

(文 任鹏)